

于稽古之中尤詳攷今事—— 從夏允彝《禹貢古今合註》析 其治水之策*

簡承禾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提 要

明代夏允彝（1596-1645）著《禹貢古今合註》凡五卷，陳子龍（1608-1647）為其作序。劉起鈞（1917-2012）說：「夏和陳都是明末愛國志士，完全從救國匡時出發而研究〈禹貢〉。」指出夏允彝〈禹貢〉著作之旨，其內容討論水利、屯田、邊防、漕運，可謂深且廣矣。本文主要集中在「治水」方面，分為兩個部分探討：國防與漕運、黃河治理。夏允彝活動於明末清初，關注邊境國防，而國防得仰賴南方資源的充實，故大力主張利用運河為漕道，對於頻繁出事的海運，則持保留態度。另一方面，黃河善徙、泛濫等問題，始終困擾明廷。夏允彝認為政府耗費大量資源築堤防止河患，但效果事倍功半，不如遷走易犯河患

* 本文雖非國科會計畫「胡渭《禹貢雒指》的經世關懷——以黃河變遷分期及其治河策略為討論核心」（NSTC114-2410-H-018-028）的主要論述。然而胡渭討論黃河時，曾徵引夏允彝的作品。筆者為文期間，亦受國科會協助；兩位審查者提供文獻資料，使成果更趨完善，謹表謝忱。

的沿岸居民，而任黃河水勢傾瀉入海，效仿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柝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以大破大立的方法治河。

除了基於務實層面的討論外，本文也留意到夏允彝《禹貢古今合註》的經學史問題。他繼承茅瑞徵（生卒年不詳）的《禹貢匯疏》，而茅瑞徵又上承鄭曉（1499-1566）《禹貢圖說》。經比對，三者的〈禹貢圖〉幾乎一致。不過夏允彝承繼前人成果的過程中，於內容解析上稍作調整，以符自己的理念。透過本文分析，可以概見夏允彝《禹貢古今合註》在經學史上的承繼與其治水之策。

關鍵詞：夏允彝 《禹貢古今合註》 治水 〈禹貢〉 黃河

于稽古之中尤詳攷今事—— 從夏允彝《禹貢古今合註》析 其治水之策

簡承禾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一、前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下稱《總目》）將十一部明代〈禹貢〉專著列入〈存目〉中^①，其意認為明代〈禹貢〉學多背離考據學。^②推其原因，〈禹貢〉所論乃山川地理，皆有可目睹，貼近考據學「實事求是」的宗旨。然而《總目》之論，忽略〈禹貢〉的「實事求是」未必要以考據方式展現，今人王榮煜指出明

① （清）永瑤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書類存目一》（臺北：臺灣印書館，1983年10月，影印武英殿本），卷13，頁13上-13下，「（韓邦奇）禹貢詳畧」；頁16上-16下，「（鄭曉）禹貢圖說」、「（鄭曉）禹貢說」；頁20下-21上，「（王鑑）禹貢山川郡邑攷」；頁21下-22上，「（俞鯤）禹貢元珠」；卷14〈書類存目二〉，頁2下-3下，「（胡瓚）禹貢備遺增註」；頁5上-5下，「（茅瑞徵）禹貢匯疏」；頁7下-8上，「（艾南英）禹貢圖註」；頁8上-8下，「（夏允彝）禹貢合註」；頁9下，「（許胥臣）禹貢廣覽」；頁10下-11上，「（疑為明人）禹貢通解」。

② 例如評《禹貢詳畧》為「訓釋淺近」，以為《禹貢圖說》「全書實多疎舛」，而宗蔡《傳》的《禹貢備遺增註》，則被批評未替蔡《傳》正誤。此外，認為《禹貢匯疏》「多借以抒寫時事」，「蓋其志不在於解經也」；說《禹貢通解》「是書頗有意於攷正，而所學未博，引據疏畧」。透露出《總目》對〈禹貢〉著作所謂「解經」，乃在考據實證方面。若考據不夠深入、踵前人之誤或藉經義發揮時事，很難被《總目》正視。

代〈禹貢〉學有三種特色：一者刪自蔡沈《書集傳》或是《書傳大全》，為舉業之用。二者藉〈禹貢〉內容，而論及建都、漕運、邊防、經濟等。三者〈禹貢〉圖多達兩百餘幅，數目遠邁兩宋。^③其中第二個特色，彰顯出明儒所著〈禹貢〉專書，意在經世濟民之用。

根據王榮煜所搜集，明代〈禹貢〉專著約有二十部。^④其中夏允彝（1596-1645）所撰《禹貢古今合註》（下稱《禹貢合註》）凡五卷，雖然卷帙無多，卻值得關注，原因有二：一者，從經學史來說，《禹貢合註》內容多承襲茅瑞徵（1577-？）《禹貢匯疏》，夏允彝曰：「〈禹貢〉自茅五芝先生彙註，網羅備具，可為一代鴻典。但意在博綜，便于稽攷〔考〕，不便于誦讀，重複渙散，類不能免。余融貫其意，使前後成章，閱者心目為清。與五芝先生相翼而不相背也。」^⑤不僅如此，《禹貢合註》書前有六十一幅「禹貢圖」，部分也是承自《禹貢匯疏》。經筆者進一步比對，《禹貢匯疏》的「禹貢圖」，其實來自於鄭曉（1499-1566）《禹貢圖說》。二者，就經世致用來說，夏允彝將書命為「禹貢古今合註」，「古今」二字，其自言：「于稽古之中尤詳攷今事，如治河、防海之類，皆可見之施行，名曰『古今合註』，意蓋〔蓋〕在此也。」^⑥同邑子龍（1608-1647）為其作序，曰：「夏子嘗憤國家之貧弱，思有以大振之。」^⑦是知《禹貢合註》意在經世濟民，並使讀者能快速掌握國家利弊得失，非徒為稽考

③ 王榮煜：《明代〈禹貢〉學研究·緒論》（濟南：山東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2019年5月），頁9。

④ 同前註，第1章〈明代〈禹貢〉學文獻述要〉，頁13-44。

⑤ （明）夏允彝：《禹貢古今合註》（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年6月，《中國歷史地理文獻集刊 第一編 禹貢集成》影印明末刻本），第3冊，頁1下。《續修四庫全書》第55冊亦收有《禹貢合註》，經比對，版本一致，皆每半葉九行，每行十九字。然而《中國歷史文獻集刊》圖版較大，對於閱讀上較為方便，尤其是《禹貢合註》附有許多「禹貢圖」，字大清晰，故採用之。

⑥ 同前註，頁2上-2下。

⑦ 同前註，〈陳子龍序〉，頁7下-8上。

古事而已。^⑧

關於夏允彝《禹貢合註》的研究成果不多，就筆者管見，僅有陳恆嵩先生〈通經以致用：明代〈禹貢〉學〉一文，其中第二節「夏允彝及其《禹貢古今合註》」討論。文中論述夏允彝的生平事跡、晚明社會如何造成〈禹貢〉學興盛，並釐為「治運必先治河」、「開渠勸農以省飛輓之勞」兩點探討《禹貢合註》的內容。申明夏允彝治〈禹貢〉乃在致用，最後得出夏允彝主張「以水濶沙」為治黃河下游的方法；以及「引水分流，以濬運河」的結論。^⑨陳先生之文，對筆者頗有啟發。雖然如此，對於《禹貢合註》的學術傳承及其內容，仍有待補充。是以本文之撰，在探討夏允彝《禹貢合註》於經學史上的承襲，及其發揮治水議論。

⑧ 審查學者亦提供另一線索，日本內閣文庫中藏有《刻夏先生書經》，登錄「著者：夏允彝（明），4冊」，見「國立公文書館」（<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search?kw=%E5%88%BB%E5%A4%8F%E5%85%88%E7%94%9F%E6%9B%B8%E7%B6%93>）（上網檢索日期：2026年1月19日）。而根據封面墨筆所書，當為六冊，大概是卷帙分合、裝訂的關係，對內容影響不大。形式與內容上，分為上下兩欄，下欄是蔡沈（1167-1230）《書集傳》全文，上欄則對應下欄內容，錄《尚書》經文並逐段疏通說解，文句流暢，幾無藉題發揮。值得注意的有二：一者，全書無序亦無跋或其他記文等。二者，後面三冊的封面有「尚書測義註」，此當是書名。筆者據「刻夏先生書經」、「尚書測義（註）」、「尚書側義」等關鍵字，在中央研究院圖書館、國家圖書館、臺大圖書館，皆無其他館藏、版本的書籍可供參考、對照。另外，據《明史》及張孔瑛輯《夏文忠公文集》所錄，目前知夏允彝有《禹貢合註》，未見其他《尚書》著作。綜合上述，內閣文庫所藏《刻夏先生書經》是否為夏允彝所著，仍有疑義，故謹誌於此，留待日後進一步探究。夏允彝所著書，分見（清）張廷玉等：《明史·藝文志》第8冊（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4月），卷96，頁2354。（明）夏允彝撰，張孔瑛輯：《輯存夏文忠公集》（清光緒年間抄本，藏浙江圖書館），附錄〈事略〉，頁（總）207。引自浙江圖書館館藏電子檔（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9/9d/ZJLib-62836c29d8147868cc53272c_%E5%A4%8F%E6%96%87%E5%BF%A0%E5%85%AC%E9%9B%86%E4%BA%94%E5%8D%B7%EF%BC%9B%E9%99%84%E9%8C%84%E4%B8%80%E5%8D%B7.pdf）。（上網檢索日期：2026年1月19日。）

⑨ 陳恆嵩：〈通經以致用：明代〈禹貢〉學〉，收於陳恆嵩：《禹貢、經筵、科舉：宋明〈尚書〉學新探》（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9年4月），頁150-179。

二、夏允彝與《禹貢古今合註》

（一）夏允彝的學術活動及撰作之由

在論及學術活動前，先簡單介紹其生平。夏允彝，字彝仲，松江華亭人。崇禎十年（1637），與陳子龍同登進士。明亡後，投淵以死。^⑩ 根據今人孫慧敏的研究，夏允彝在南京被攻破後，為拒絕清政府官員辟召的壓力，遂以死明志，他認為凡是隱遁、逃禪，全屬偷生行為。^⑪

實際上，關於夏允彝詳細的學術活動，文獻所載無多，但可以從學術大環境的現象來看。除明代〈禹貢〉學的自有其特色外，更要思考的是，夏允彝處於什麼環境？何以撰《禹貢合註》來討論明季的國家政策？這要稍加瞭解其活動背景。夏允彝與東林人士張溥（1602-1641）、楊廷樞（1595-1647）等人結「復社」；又與同邑陳子龍、何剛（？-1645）、徐孚遠（1600-1665）、王光承（1606-1677）等結「幾社」。復社以張溥、張采（1596-1648）為首，是「集郡中名士相與復古學，名其文社曰復社」，並以紹東林之緒為己志。^⑫ 於學術上，尊經重史，亦講究實學，也就是經世致用之學。^⑬ 張溥曰：「余間語同志，讀書大事，當分經、史、古、今四部。讀經者，輯儒家；讀史者，辨世代；讀古者，通典實；讀今者，專本朝。就性所近，分部而治。」又曰：「客年與余，盱衡當

⑩ （清）王鴻緒等：《明史稿列傳·夏允彝》，收於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 附索引》第97冊（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1月），卷153，頁13下、14上。（清）張廷玉等：《明史·夏允彝》第23冊，卷277，頁7099。

⑪ 孫慧敏：〈書寫忠烈：明末夏允彝、夏完淳父子殉節故事的形成與流傳〉，《臺大歷史學報》第26期（2000年12月），頁272-276。

⑫ （清）王鴻緒等：《明史稿列傳·夏允彝》，卷153，頁13下。（清）張廷玉等：《明史·張溥》第24冊，卷288，頁7404。

⑬ 劉莞莞：《復社與晚明學風·復社之學術與晚明學風》（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年6月），頁79-84、90-103。丁國祥：《復社研究·復社的政治與學術思想》（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年12月），頁118-127。

代，思就國史。余謂賢者，識大宜先經濟。」¹⁴ 主張學者宜就自己的本性，選擇四部以治之，然而無論如何選擇，總在「經濟」一途。¹⁵ 陳子龍亦主張學問之用在於「實」，其曰：「夫保殘守缺，則訓詁之文充棟不厭；尋聲設色，則雕繪之作永日以思。至於時王所尚，世務所急，是非得失之際，未之用心。苟能訪求其書者蓋寡，宜天下才智日以絀，故曰士無實學。」¹⁶ 學問是要解決世務，以輔君王。如果汲汲於訓詁考究，將書本學問做得極精細，不免連篇累牘而難有止盡。

夏允彝同是復社成員，「允彝學務經世，歷朝制度暨昭代典章，無所不諳習。獨處一室，志常在天下」。¹⁷ 舉例來說，夏允彝對家鄉環境頗為關心。松江位在海濱之地，他感念前賢改善海塘而撰文為記：「嗚呼！無事而幸安，猶不免傳舍之譏，況有事而不為之所，坐視其危潰也哉！吾松枕海而居，海日嚙〔嚙〕壤而入，幾於蠶食。松之城，故在金山之趾，今山淪入大海中，猶冀碣也。每值波裏，殺稼漂人，不可勝計。」¹⁸ 關心自己家鄉被海水侵蝕嚴重，只要海水變動較大，便會有致災性的洪水；相關官員不積極規畫治水，反而以官位為傳舍，只求安穩度日。夏允彝總結修築海塘有三難：一者，築塘材料取得，所費不貲。若以相對便宜的土塊築塘，因為海潮的關係，無法長久，唯有以石頭、石塊砌

¹⁴ （明）陳子龍等輯：《皇明經世文編·張溥序》（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1月，《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明崇禎雲間平露堂刻本），集部第22冊，頁2下-3上、3下。

¹⁵ 張溥所謂「經濟」者，未必專就高堂之上的知識份子而言，其在鄉里，亦可以有所為。嘗曰：「于是有志者思洪、宣之世，風俗淳質。賢者各明經以窮理，居敬以反身，中庸之流，奉承不悖。士子有三年不課舉子文者，而閭巷之父兄長老，各誦習《小學》、《性理》、《通鑑》諸書，及御製《大誥》、榜文，則至治已。而今不可復也。」見（明）張溥：《七錄齋集·建學論》（《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明崇禎吳門童潤吾刻本），集部第182冊，卷1，頁47下。主張依每個人的個性，選擇學問門徑；就所選門徑，對於國家、社會都有不同角色之功用。如果能搭合作，則國家治矣。是以張溥的「經濟」之說，不專為居官者言。

¹⁶ （明）陳子龍等輯：《皇明經世文編·陳子龍序》，集部第22冊，頁5上-5下。

¹⁷ （清）王鴻緒等：《明史稿列傳·夏允彝》，卷153，頁14上。

¹⁸ （明）夏允彝撰，張孔瑛輯：《輯存夏文忠公集·海塘序》，卷3，頁（總）109。輯者張孔瑛（生卒年不詳）指出此篇雖名為「序」，就內容而言是「記」。為清眉目，全書電子檔請見參考文獻。

成，方能穩固而長久，但衍生的費用便會加在松江甚至鄰近鄉邑的百姓身上。¹⁹二者，考量地基所用需要巨木，以及地基要深，石塊應加以施工，方能有阻水、防水效果。這些工程及材料，都要有人力監工與審核，但人才難得，人力難覓。三者，當地人習慣不與海爭地，海水侵蝕之地，則選擇將海塘內移，致使長年下來，無堅固的海塘。他認為這種想法實在大謬，因為「賦稅出焉，不宜復割以餌海」，再者「松壤有涯，而海嚙〔嚙〕無已」。究其實，三件難事主要是經費問題，夏允彝稱許前賢捐產、出力，「不暮年，塘工告成」。²⁰由此可見，夏允彝對於家鄉水利興衰之事有相當的瞭解，亦見其「學務經世」的精神。他自謂撰寫《禹貢合註》之意：「水利、屯田、邊防、漕運，尤詳其說，旁及鹽法、賦役，無不推其源流，酌其利害，此余意所獨存，故語不厭詳焉。」²¹道出所著本為經世致用，非案上考索之著。夏允彝稱《禹貢合註》是刪自茅瑞徵的《禹貢匯疏》，指的是其著書的取材。此外可留意的是，其父親夏時正（1560-1627）對〈禹貢〉亦有關注。陳子龍受夏允彝、夏之旭（允彝之兄，？-1647）之託，替夏時正寫傳，傳曰：

既就塾師，於書一過，即暗誦不遺。稍長，甚工博士業，有所辨難，恒

¹⁹ 古代修築海塘是件不容易的事，距離夏允彝兩個世紀的阮元（1764-1849），在松江府華亭之南不遠的海寧一帶修海塘，說道：「今之海塘所以捍潮，元撫浙修塘，月必至焉。自尖山至海寧州以西隄，雖險而地勢高，惟老鹽倉西南至杭州府城東北數十里中，地勢低平，潮汐來，活沙無定，有朝為桑田莫〔暮〕成滄海者。且加築隄塘，難施椿石，濬之愈深則沙性愈散，不如老鹽倉東北鐵板沙之堅固。」見（清）阮元：《學經室集·浙江圖考上》，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第147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影印道光阮氏文選樓刻本），第1集卷12，頁2上-2下。雖然所述地理位置不同，但道出即使鄰近省份的沿海土壤相異，築塘所須丈量、加固地基、選石材等工程，皆非易事。若無政府經費支持，僅從民間加重賦稅，工程也難以施作。明、清東南一帶的行政沿革不大，華亭、海寧二地，分見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清時期》第8冊（北京：中國歷史地圖集，1987年4月），頁16-17，「江蘇」⑤-7、⑥-6。

²⁰ （明）夏允彝撰，張孔瑛輯：《輯存夏文忠公集·海塘序》，卷3，頁（總）109-112。

²¹ （明）夏允彝：《禹貢古今合註·凡例》，頁1下-2上。

〔恆〕誦其師。出應童子試，會江陵公當國，功令嚴，大邑所取諸生僅數人，而先生冠其曹。先生故治《尚書》，然俗師不習〈禹貢〉，獨弗授也。將就試，一夕，先生乃誦且稽註傳，質明而主者以〈禹貢〉策士，先生獨弗誤。²²

這裡無妨從明代士子讀〈禹貢〉的情況稍作說明。據侯美珍先生的研究，明代會試以〈禹貢〉出題，凡九次，排序第七；鄉試則出了八十一次，排序第四。顯示出〈禹貢〉是備考時不可忽略的篇章。但〈禹貢〉為《尚書》最長篇章，加上涉及古代地理，今人不通，古人亦是，為了解決考試上問題，坊間遂出現刪節本，以供考生準備。²³〈禹貢〉之難，致使塾師與考生在準備上多半抱著僥倖的心態，而夏時正應試前夕留意到〈禹貢〉，也正中策論題目，故能弗誤。陳子龍或許於撰寫時，帶有些人情之故，卻也道出〈禹貢〉於考試之中，乏人關注，唯夏時正考前臨時閱讀、記誦，故能「誦且稽註傳」、能「獨弗誤」。因此，夏允彝關注〈禹貢〉有可能是受其父親的影響，只是文獻上難以確定。²⁴不過，夏允彝明確自述研究〈禹貢〉之由，曰：

余少侗愚，每行道路輒迷，往來長偕陳臥子出入，見其留意博詢，凡水泉之曲折，塗徑之分岐，必明晰而後已。因念即此是學，欲作地里〔理〕圖，訪朱思本意，為之增益其所未備，兼為之說，而于用兵險要、水利、

²² （明）陳子龍：《安雅堂稿·夏方餘先生傳》，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第1388冊（影印明末刻本），卷13，頁20下。

²³ 侯美珍：〈明代鄉會試《尚書》義出題考察——以考官出題偏重為主的討論〉，《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47期（2015年9月），頁148-149、157-159。

²⁴ 清雍正時期《浙江通志》載有夏時正撰《禹貢略》一卷、纂修《杭州府志》六十四卷，然而此夏時正非明末夏時正，唯其同名同姓而已。見（清）李衛等修，沈翼機等纂：《（雍正）浙江通志》，收於孫學雷主編：《地方志·書目文獻叢刊·經籍》第16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12月，影印清光緒二十五年浙江書局刻本），卷241，頁22下。（清）張廷玉等：《明史·藝文志》後加第24冊，卷97，頁2411。

屯田、城池、賦稅，尤加詳焉。其說閎遠，非數年不能竣，先舉其大略為《禹貢古今合註》。²⁵

朱思本（1273-1333），元朝地理學家，大約於至大四年至延祐七年（1311-1320）繪有《輿地圖》，其圖今已佚，然而明代不少地理學家，多受朱思本作品的影響而模繪輿圖，例如：清浚（1328-1392）與李澤民（生卒年不詳）取朱思本作品名，也稱作《輿地圖》；羅洪憲（生卒年不詳）則根據朱思本之作，增纂成《廣輿圖》。²⁶ 朱思本走訪各大山川，參考《水經注》、《大元一統志》等書，以「計里畫方」的方式繪圖，使輿圖有里程可案，然而「至若漲海之東南，沙漠之西北，諸番異域，雖朝貢時至，而遼絕罕稽。言之者既不能詳，詳者又未必可信，故於斯類，姑用闕如。」²⁷ 正因為朱思本謹慎闕如的態度，加上平時受到陳子龍平時探勘山水地貌的影響，夏允彝遂「為之增益其所未備，兼為之說」。至於夏允彝是否看過朱思本的《輿地圖》，文獻上難以判斷；然而另一種可能，即夏允彝見過其他學者的摹本，故而說「訪朱思本意」。無論如何，從其所繪製的「禹貢圖」，知輿圖是沿自茅瑞徵《禹貢匯疏》來，以下將予說明。

（二）《禹貢古今合註》「禹貢圖」的來源

前述夏允彝謂其書是來自茅瑞徵《禹貢匯疏》，書前所附的「禹貢圖」也是翻自茅氏之書。不過筆者進一步比對，《禹貢匯疏》的「禹貢圖」實是源於鄭曉《禹貢圖說》。為使比對簡明扼要，表格將以《禹貢合註》為基礎，《禹貢匯疏》、《禹貢圖說》與之「完全相同以●表示」，「輿圖名稱略異以▲表示」，「缺輿圖名稱以X表示」，「沒有繪製輿圖以／表示」，「《禹貢合註》圖旁附

²⁵ （明）夏允彝：《禹貢古今合註·凡例》，頁1上。

²⁶ 陳佳榮：〈元明間《輿地圖》源流考思〉，《海交史研究》2014年第2期（2014年12月），頁37-38、40。

²⁷ （元）朱思本：《貞一齋詩文稿》，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第1323冊（影印宛委別藏清抄本），不分卷，頁10上。

有文字說明以★表示」，其餘情況則在備註說明，對照表於下：

表 1 三家「禹貢圖」對照表

《禹貢古今合註》	《禹貢匯疏》	《禹貢圖說》	備註
禹貢全圖	▲	▲	《禹貢合註》輿圖較二書更為精簡
冀州疆界 / 冀州貢道	●	▲	
兗州疆界 / 兗州貢道★	●	▲	
青州疆界 / 青州貢道★	●	▲	
徐州疆界 / 徐州貢道	●	▲	三者輿圖說明詳略不同
揚州疆界 / 揚州貢道★	●	▲	
荊州疆界 / 荊州貢道★	●	▲	
豫州疆界 / 豫州貢道★	●	▲	
梁州疆界 / 梁州貢道 ²⁸ ★	●	▲	
雍州疆界 / 雍州貢道★	●	▲	
導北條大河北境之山圖	●	X	
導北條大河南境之山圖	●	X	《禹貢圖說》輿圖說明較詳
導南條江漢北境之山圖	●	X	
導南條江漢南境之山圖	●	X	
導弱水圖	●	X	《禹貢圖說》輿圖說明較詳
導黑水圖	●	X	《禹貢合註》輿圖說明與《禹貢圖說》稍異，但與《禹貢匯疏》相同
導河圖一	●	X	
導河圖二	●	X	
導江漢圖	●	X	
導濟水圖	●	X	《禹貢合註》輿圖繪製與《禹貢匯疏》相同，《禹貢圖說》較精簡
導淮水圖	●	X	《禹貢合註》輿圖繪製與《禹貢匯疏》相同，而其左半幅較《禹貢圖說》詳細

²⁸ 《中國歷史地理文獻集成》誤植為「冀州」，《續修四庫全書》不誤，見頁（總）12。

《禹貢古今合註》	《禹貢匯疏》	《禹貢圖說》	備註
導渭水圖	●	X	
導洛水圖	●	X	
堯制五服圖 ²⁹	●		
禹弼五服圖 ³⁰	●		
帝京圖	●		
唐虞冀都圖	●		
洛邑圖一	●		
洛邑圖二	●		
秦都咸陽圖 ³¹	●		
九州分星圖	●		
唐一行山河兩戒圖	●		
漢郡國圖	●		
唐十道圖	●		
宋九域圖	●		
鎮戍總圖	●		
河源圖一	●		
河源圖二	●		
漕河圖一	●		
漕河圖二	●		
漕河圖三	●		
漕河圖四	●		
漕河圖五	●		
漕河圖六	●		
漕河圖七	●		《禹貢合註》輿圖說明與《禹貢匯疏》相異

²⁹ 《中國歷史地理文獻集成》脫「堯制五服圖」圖名，《續修四庫全書》可見其名，見頁（總）20。

³⁰ 同前註。

³¹ 《中國歷史地理文獻集成》圖名作「都咸陽圖」，誤。當作「秦都咸陽圖」，見《續修四庫全書》，頁（總）21。

《禹貢古今合註》	《禹貢匯疏》	《禹貢圖說》	備註
漕河圖八	●		
河套圖一	●		
河套圖二	●		
禹周秦漢五沮漆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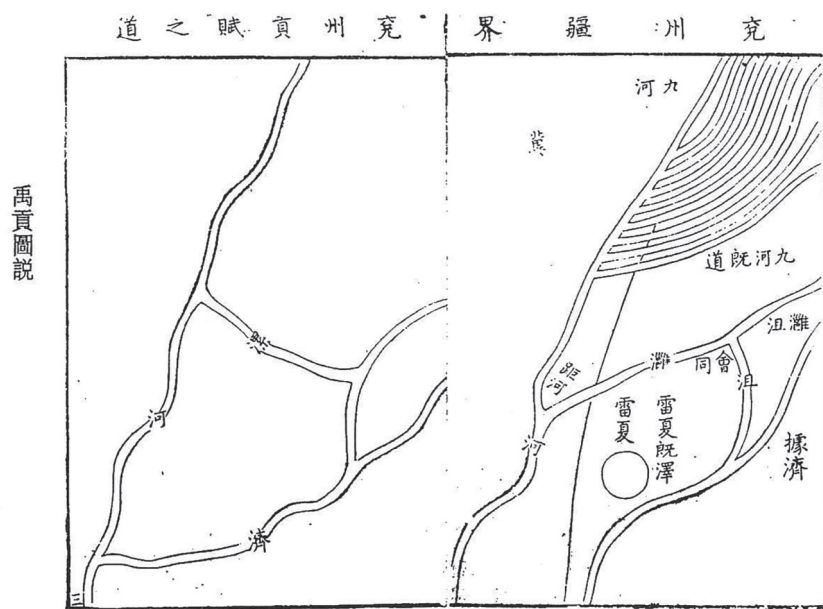


圖 1 鄭曉《禹貢圖說》兗州疆界、兗州貢賦之道³²

³² (明)鄭曉：《禹貢圖說》，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第54冊（影印明刻項臬謨校本），頁（總）43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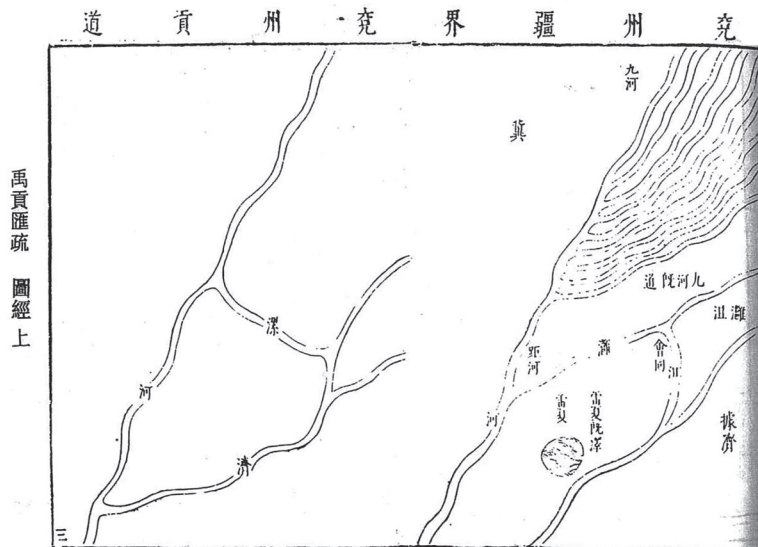


圖 2 茅瑞徵《禹貢匯疏》兗州疆界、兗州貢道³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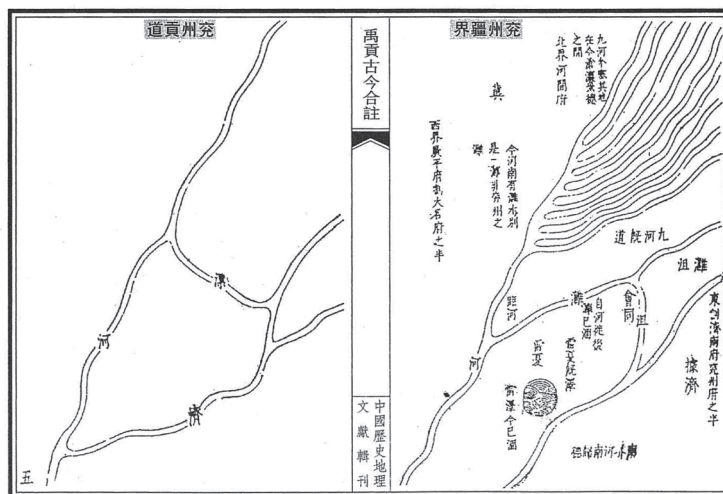


圖 3 夏允彝《禹貢古今合註》兗州疆界、兗州貢道³⁴

³³ (明)茅瑞徵：《禹貢匯疏》，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第54冊（影印明崇禎刻本），頁（總）505-1。

³⁴ (明)夏允彝：《禹貢古今合註》，頁（總）12。

從上表來看，《禹貢合註》的「禹貢圖」主要來自《禹貢匯疏》，而《禹貢匯疏》則沿自《禹貢圖說》，唯其說解稍異。這裡以三本書的「兗州」為例，《禹貢匯疏》與《禹貢圖說》的「兗州」一致，雖然《禹貢合註》的圖與二者相同，不過於「九河」旁多了說明，曰：「九河今塞，其地在滄、瀛，景德之間。」至於「九河既道」的論述，鄭曉《禹貢圖說》說法簡要：「此治河也。洪水之患，惟河爲甚。兗當河下流之衝，被害尤劇。……分爲九派〔派〕，以殺河勢耳。」³⁵ 論禹之所以鑿九河，目的是要減緩河水流量的問題，不使決溢。茅瑞徵則徵引歷代之說，但無所制斷。³⁶ 夏允彝雖然是從《禹貢匯疏》刪節而來，仍自有看法；以「九河既道」來說，徵引的文獻與《禹貢匯疏》相同者甚多，有《尚書正義》（下稱《正義》）、余闕（1303-1358）、《漢書·溝洫志》所載馮遂、關並之語，及南北朝時期韓牧（三者的生卒年皆不詳）的話³⁷，最後自下案語：

按，九河在今滄、瀛，景德之間，或者求于此而不得，則以爲淪入于海。又或以爲齊桓填閼八流以自廣，止存徒駭。不知河昔北流，故分爲九河。自周定王五年，河道既改，則九河漸湮，豈得經流既息而支流仍在乎？縱非海水淪沒，其故迹〔跡〕可得而復求乎？……大率河底常高，今于開封測其中流，冬、春深僅丈餘，夏、秋倍之。水行地上，初無長江之淵深，故自古瀕河之地，每有非常之水，河必驟盈，盈則決；每決必彌漫橫流，深者成渠，以漸成河；淺者淤澱，以漸成岸。數年之後，下流既淤，則中流河底又以漸而高，而河又不容於不徙矣。既徙之後，則故道遂爲平陸。³⁸

³⁵ （明）鄭曉：《禹貢圖說》，頁8下-9上，「九河既道」。

³⁶ （明）茅瑞徵：《禹貢匯疏》，卷2，頁5下-14下，「九河既道」。

³⁷ （明）夏允彝：《禹貢古今合註》，卷1，頁29上-30下，「九河既道」。

³⁸ 同前註，頁30下-31下，「九河既道」。

夏允彝認為九河之目，早已不可覓得，不必瑣瑣於哪幾處是九河之中的某河，因此求九河的範圍即可。夏允彝認為九河範圍在「滄、瀛，景德之間」，不過由於近入海處，因此早已為海水所浸。然而，夏允彝的重點不在於古跡的探求，而是討論治河的原理、原則。他指出九河的範圍已被海水侵蝕，表示此處易於淹水，加之中、上游帶下來的泥沙，容易淤積，也可能使下游河床變高，反覆如此，則會造成三種災害：河水四處溢流、河道遷徙不定、河水回堵進而影響中、上游。此三者皆增加民生困擾，故夏允彝主張「要以入海之所固宜分疏之，使速泄；下流速泄，則上流不壅，河之利也。」³⁹ 說法與前述鄭曉相近。指出治河當以疏導為主，使之分流來減緩過大的水勢，並認為下游治，則上游不壅，就此可以窺見夏允彝的思慮不僅限於下游，而是整條黃河。

整合而言，夏允彝所以關心〈禹貢〉除了自述受陳子龍影響以外，主要還是自身對地理山水的關心。夏允彝自謂《禹貢合註》是承自茅瑞徵的著作，經筆者比對，「禹貢圖」確實沿自《禹貢匯疏》，《禹貢匯疏》則又襲自鄭曉的《禹貢圖說》。至於論述上，夏允彝確實簡化《禹貢匯疏》近於學術性質的寫法，其目的乃在提出治河理水的大方向。

三、《禹貢古今合註》對國防與漕運的觀點

陳子龍替《禹貢合註》作序，指出國家不重視畎〔畎〕、遂、溝、洫、澮，「故西北之荒蕪者半天下。至於國家歲費數十百萬之資，漕荊、揚之粟，以給京師，而西北邊萬餘里，皆仰灌輸於內。」⁴⁰ 道出兩個問題：一者，政府忽視水

³⁹ （明）夏允彝：《禹貢古今合註》，卷1，頁31下，「九河既道」。

⁴⁰ 同前註，〈陳子龍序〉，頁3上-3下。「畎〔畎〕、遂、溝、洫、澮」，是水道深廣之別，《周禮》：「廣尺、深尺，謂之畎」，「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雖然講的是田間水道，但諸水道可通達河川，既利於農作，也有助於運輸。見（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匠人》，收於《十三經註疏》第3冊（臺北：藝文印書館公司，2007年8月，影印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本），卷42，頁1上-6下。

利，致使西北邊陲之地，長期處於荒蕪的情況。二者，糧食、物資藉水道自南方往北方運輸，全賴政府經費維持。整合來說，國防與漕運，兩者習習相關，而這正是夏允彝所關心的議題。

明代的都城有三，上都燕京（今北京），下都應天（今南京），以及中都臨濠（今鳳陽）。開國之初，太祖朱元璋對於定都一事，頗多考量，其在世之時，前後規畫三處作為都城：南京應天，北京開封，中都臨濠。之所以如此，是考慮應天無險可守，所以選在自己家鄉臨濠建立中都。太祖後來又慮及臨濠交通不便，資源匱乏等因素，在動工五、六年後，宣布罷工。其實，選擇都城是君臣共商所得的結果，當時御史胡子祺（1333-1377）上書分析天下形勝可定都者有四：河東可控西北，唯其苦寒；汴梁依於黃河、淮水，惜無天險可守；洛陽雖然是周、漢之都，可惜嵩山、邙山不如穀、函來得險峻，周遭河水也不足以為據；唯有關中，有山河之險，又可號令諸侯，最為稱善。雖然胡子祺所建議的四個地方都沒有成為明代都城，卻也引起太祖的重視，要求經營關中，頗有以為都城之意。⁴¹這顯示明代選址建都的考量，首重於國防，因而要求天險或關隘，以維帝都。

建都選址的考量，不能僅止於國防，也要慮及經濟命脈，而經濟航道又與軍事息息相關。劉侗（約 1593-1637）曰：「帝北宅南嚮，威夷福夏，玉食航焉。蓋〔蓋〕用西北之勁，制東南之饒；亦用東南之饒，制西北之勁。饒、勁各馭，勢長在我。」⁴²東南與西北，當能相互支援，而能支援者莫過於漕運，一旦漕運阻塞、中斷，邊疆就會有潛在的危險。然而「邊疆」是相當廣泛的概念，包括歷史、地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其中尚得考察歷史上外患對各朝代的影響等因素，因此「邊疆」是頗為複雜的問題。⁴³不同朝代固有其著重的邊

⁴¹ （清）張廷玉等：《明史·興宗孝康皇帝》第12冊，卷115，頁3549-3550。楊宏雨：〈湮沒的帝都與大明的興亡〉，《哈爾濱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1年第1期（2021年1月），頁94-96。

⁴² （明）劉侗：《帝京景物畧·敘》，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1996年8月，影印天津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史部第248冊，頁1上。

⁴³ 馬大正：《中國邊疆經略史·中國邊疆通史叢書總序》（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10月），頁1-22。

疆區域，即使同一朝代也有相異的側重範圍。就明代來說，早期重視北疆這大片區域，以防範蒙古；晚期面對後金的興起，於是專注經營東北。無論早先對蒙古的防範，還是晚期防止後金政權，其北方一帶的外患，對明代國都、軍事皆存有威脅⁴⁴，學者透過解讀〈禹貢〉，提出如何運輸以支持邊疆的看法。〈禹貢〉冀州「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碣石」具體位置，眾說紛紜，不過總在「島夷」附近，所謂「島夷」即遼東近於朝鮮海西之域⁴⁵，是明代後期的焦點地區。夏允彝《禹貢合註》多襲自茅瑞徵《禹貢匯疏》，先看茅氏之說：

國初尚通海運，山東一省，錢鈔布花，由海道給遼，今山海城南泊舟遺址猶存，而運道久廢不復講矣。……丘氏濬曰：「國家都燕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況自古皆是轉般而以鹽為傭直。今則專役軍夫長運，而加以兌支之耗，歲歲常運，積糧雖多，戍卒日少。請尋元人故道，別通海運，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小注：浙江布政司及常州、蘇州、松江三府）由海通運，使人知習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預防之計也。」……國家定鼎幽燕，亦冀州境，則近黃帝涿鹿之阿矣。元學士郝經云：「燕都東控遼碣，西連三晉，背負關嶺，瞰臨河朔，南面以臨天下。」誠為海內形勝要區，乃今日轉漕全仰給東南，以會通河為咽喉，萬一運道中梗，危證立見。先年併通海運，有遮洋一總，遺意尚存，似宜及時講究，以佐緩亟。而西北水田，向議開墾，旋行旋罷，終鮮實心。任事者若能多方設法耕治，彌望田疇，不特可漸省轉漕，兼得增脩地險，以限戎馬之足，固帝都萬世永利也。⁴⁶

⁴⁴ 馬大正：《中國邊疆經略史·明朝的邊疆經略》，頁222-225、227。

⁴⁵ （清）胡渭撰，鄒逸麟整理：《禹貢錙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1月），卷2，頁58-62，「島夷皮服夾石碣石入于河」。（明）茅瑞徵：《禹貢匯疏》，卷1，頁45下，「島夷皮服」。

⁴⁶ （明）茅瑞徵：《禹貢匯疏》，卷1，頁47上-49下，「夾右碣〔碣〕石入于河」。

自成祖（1360-1424）遷都燕京後，首都不曾再變動。從茅瑞徵引用丘濬（1420-1495）的觀點來說，南方分爲江西、湖廣等地爲一域，浙西、東部瀕海爲一域；前者利用河運，後者當用海運，兩者並行以分散運輸風險。同時亦見明代海運的路線相當遙遠，一路自東南至遼東，主要原因是東南爲經濟發達的地區，首都、邊防等，不得不仰賴東南財賦。茅瑞徵同意丘濬的觀點，認爲燕京之所以形勝，不僅在有倚山水之險，亦有控東南經濟之勢，但經濟全賴河運，風險大增，因此認爲要恢復海運，並且開墾西北方，從多方面抒解東南方的壓力，但是夏允彝持不同看法，其曰：

國初尚通海運，山東之賦，浮海給遼，今久廢矣。昔秦始皇起皇腫瑯琊負海之粟，轉輸北河，唐時又通東吳之粟于此，元時漕東南粟于燕，歲歲四百萬石，天生鉅海。以為國家輝道，何為久置之？近者旅順未失，頗由海通輝，然無益大計也。又案，唐神龍中，姜師度于薊州，北漲水為溝，以備〔備〕契丹奚之入寇。宋自雄州東際于海，多積水，戎人患之，不敢由此路入寇。順安軍至北平二百里，地平廣，無隔閼，每歲胡騎多由此入。議者謂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濬溝洫，以實邊稟而限戎馬。蓋〔蓋〕宋失燕、薊，以內地為邊，故恃塘濬以設險。今塘濬不必如宋，而濬溝洫以興農制虜，則不刊之長策也。⁴⁷

比對上下兩段引文，夏允彝刪改自茅瑞徵的文章，包括丘濬的文字。可留意者，由於明代外患隨時間而有不同。約略而言，明萬曆三十二年（1604）以前，主要壓力來自蒙古；隨後逐步轉向東北各部政權。崇禎（1628）以後，後金政權成爲明政府主要外患。因此學者論述時，一方面既要兼顧首都的需求，對國防壓力來源也有考量。不同時期的學者，面對的問題自是相異，故茅瑞徵著重西北地區，夏允彝則注意東北旅順。夏允彝歷數秦、唐、元等各朝代，皆重視海運；唯可惜

⁴⁷ （明）夏允彝：《禹貢古今合註》，卷1，頁26上-27上，「夾右碣石入于河」。

的是，明政府廢棄海運已久，再次經營，恐有困難，因而認為「無益大計」。由海運而遼東的路線，在明代開國之初有經營過一段時間，《明史》載「（洪武五年，1372）靖海侯吳禎督海運，餉遼東」、「（永樂元年，1403）督海運，餉遼東、北京，歲以為常」，其中在洪武三十年（1397）停止遼東海運。自永樂以後，海運罷復不定，然大抵上沒有再經營海運，直到神宗萬曆四十六年（1618）才又重啓海運，因為建州女真攻克清河堡（史稱撫清之戰），於是利用海運以餉遼東。崇禎十二年（1639），廷臣紛紛建議恢復海運，於是海運始較過往認真經營。⁴⁸之所以主張恢復海運，除節省經費外，主要原因與遼東戰事有關，熊廷弼（1569-1625）於萬曆四十八年（1620）三月上疏，云：「『合請本部院裁奪，亟催海運之糧前來接濟，以救然眉，等因。』到臣，臣不覺仰天而歎。今日之糧草如何處置？今日之軍馬如何養活？今日之防守如何支持？今日之遼東如何存救？憂愁恐懼而恨不欲死也。」⁴⁹上文所舉茅瑞徵主張河運、屯田、海運多管齊下。然而時過境遷，已錯失再建運道的機會，夏允彝對於恢復海運，持保留態度，所謂「餽」乃運糧之義。⁵⁰他認為東有大海，但海運廢之久矣，重啓的意義不大，認為只要能固守路陸，並於邊防屯田，自可阻鐵騎南下。遼東戰事告急，為什麼夏允彝不認同重啓海運呢？像茅瑞徵三管齊下，豈不是更能支持前線？蓋夏允彝所以不願支持的原因有二：其一，海運風險高，崇禎時期的漕運總兵說：

⁴⁸ 依序請見（清）張廷玉等：《明史》第1冊，卷2〈太祖〉，頁27；卷6〈成祖〉，頁79-80；卷3〈太祖〉，頁54；第2冊，卷21〈神宗〉，頁291；第6冊，卷76〈職官〉，頁1871；第7冊，卷86〈河渠〉，頁2113-2117。

⁴⁹ （明）熊廷弼：《經遼疏牘·糧草罄盡疏》，收於沈雲龍選輯：《明清史料彙編 第二輯》第9冊（永和：文海出版社，1967年5月），卷3，頁4下。

⁵⁰ 餽，《說文解字》：「野饋曰餽」。《左傳》：「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餽諸穀。」杜預（222-285）曰：「運糧饋之。」段玉裁（1735-1815）曰：「按，餽之言運也，遠畧〔詞〕也。」分見（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萬卷樓出版公司，2002年8月），第5篇下，頁13下。題（春秋）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左傳正義》，收於《十三經注疏》第6冊（臺北：藝文印書館公司，2007年8月，影印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本），卷26，頁8下。是知「餽」乃運糧之義。因此引文底線，夏允彝指國家運糧之道，本來倚賴海運，但衡諸情勢與環境，應該調整。請見下文說明。同時亦感謝審查學者提供相關文獻，使筆者對「餽」字的解釋更為精確。

「在昔海運，歲溺不止十萬。載米之舟，駕船之卒，統卒之官，皆所不免。今人策海運，輒主丘濬之論，非達於事者也。」⁶¹海運固然可以省下不少費用，不過出事率過高，反而形成資源浪費。其二，仰賴海運，反而誤事。熊廷弼同樣一份奏疏，末尾抄錄聖旨：「前有屢旨著設法趲運，各官全不經心，以致缺乏之罪，將誰諉海運糧石。著督餉官多方催趲，務期早到，已過海的。」海運風險高，卻又全賴海運送餉，加上官員漫不經心，海運成為無法運抵的一條路。有鑑於此，夏允彝不討論海運之事，而提議「因水、陸之便，建仟陌，濬溝恤，以實邊稟而限戎馬」，並且認為這是「不刊之長策也」。

明代將都城移至燕京，固然是出於國防考量，夏允彝卻認為不能因此忽略南都應天府，而且他倡議要加強南方河運的順暢，如此能使兩都相互照應，則國家安矣，夏允彝曰：

今之運河，自瓜儀至淮安，則南資高寶諸湖之水，西資淮、黃二河之水。繇淮安至清口，則資黃河與山東汶、泗之水；繇清口至鎮口閘，則資黃河與汶、泗之水；繇鎮口閘至臨清，則資汶、泗及諸泉水；繇臨清至天津，則資汶、河與漳、衛之水，繇直沽入海；而自天津至都，則資潞、白、桑乾諸水矣，此今運之大畧〔略〕也。至萬曆朝開泇河，以避呂梁之險；天啟年又開駱馬湖以接泇，而其所資於黃河者亦少。若再開石崇湖以接泇，縱河使北，不復資之，良為上策，惜今未行也。若古之徐州，并有大野，東原、嶧陽、泗濱，襟帶亦遠。今頗裂其地為郡邑，而以一州斗絕自立，乃綰轂水陸，實為南北咽喉，而山川險阻，俗多疆悍，自昔為四戰之國，且河水橫嚙，比間其魚，雖泇河改運，漕已他徙，而彭城形勝，奸雄所睥睨，固當深慮。識者謂欲聯屬兩都，以制天下，則揚州、臨清、徐州，皆為重鎮。蓋〔蓋〕臨為梁、冀、青、兗之會，揚為江、淮、汴、海之交，徐為梁、冀、青、兗、江、淮、汴、海之限，不其重歟？⁶²

⁶¹ （清）張廷玉等：《明史·河渠》第7冊，卷86，頁2117。

⁶² （明）夏允彝：《禹貢古今合註》，卷2，頁12上-13上，「浮於淮泗達於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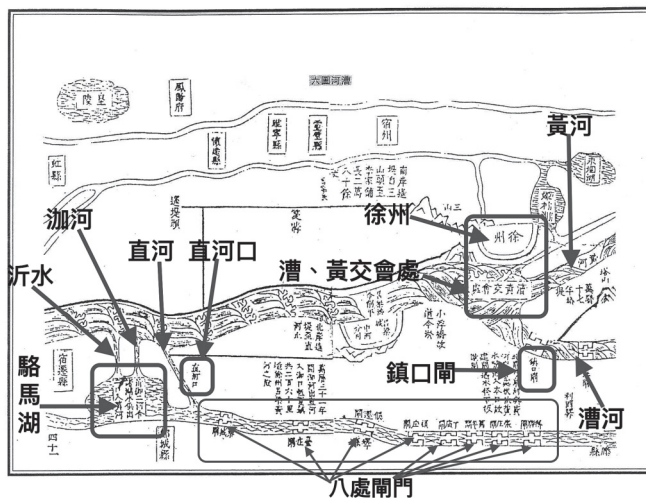


圖 4 《禹貢古今合註》「漕河圖六」(西)⁵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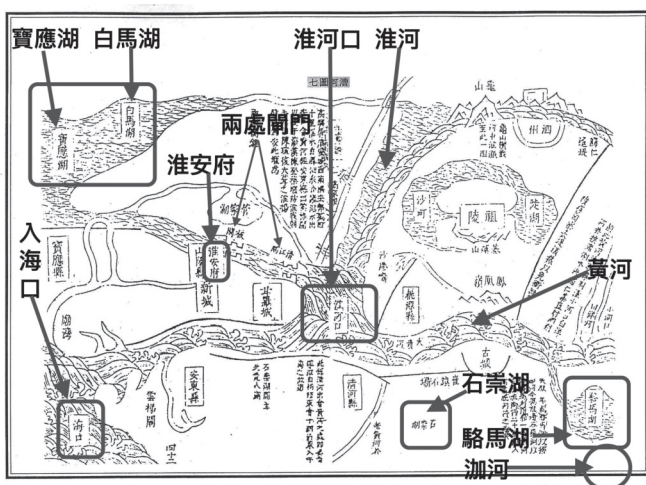


圖 5 《禹貢古今合註》「漕河圖七」(東)⁵⁴

⁵³ (明)夏允彝：《禹貢古今合註》，頁(總)43，「漕河圖六」。夏允彝所繪輿圖，是從北方視角往南望，因此南北、東西向皆相反，故特別標明東西向。此圖亦請參照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元明時期》第7冊，頁47-48，「南京」，①-3~①-5、②-5。

⁵⁴ (明)夏允彝：《禹貢古今合註》，頁(總)44，「漕河圖七」。請參照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元明時期》，頁47-48，「南京」，①-5~①-6、②-5~②-6。

夏允彝認為漕運宜從山東行河運轉陸路，但山東的河運也須藉重南方河道，而中國江、河多呈東西走向，所以應當透過漕運溝通南北。他分為瓜儀至淮安、淮安至清口、清口至鎮口閘、鎮口閘至臨清、臨清至天津、天津至直沽入海，共六段，概述運河流向與臨近河水的關係。圖 4 至圖 5，是由西而東，黃河與運河在鎮口閘合流，途經直河、泇河、沂水、淮河，然後入海。夏允彝認為與黃河相通的泇河，主要水源除了黃河外，駱馬湖亦為水源之一⁵⁵，但水量要成為漕道，猶有不足，因此認為應於駱馬湖之東開鑿石崇湖，以資泇河，充實水量。其主張是想利用泇河以取代黃河成為漕道。如此一來，即使黃河善淤、善徙，也不會影響漕運，或是將影響降至最低。

這裡須進一步討論的是，夏允彝深惜未開鑿石崇湖以濟泇河⁵⁶，他提到「古之徐州」「實為南北咽喉」。事實上，徐州段的運河頗為複雜，牽涉兩個主要問題：一者，水位落差大，造成水流湍急，加上水中伏有許多怪石，易使船隻受損，造成人員傷亡。二者，黃河與徐州段運河重疊，而黃河在明代二百七十七年的統治期間，泛濫、遷徙的年份加起來有百餘年，平均兩年左右危害一次，影響運河的水位。綜合來說，徐州段運河水流不足，主要是受到黃河改道，或黃河入淮的影響；其他自然因素，致使人員受傷與財產損失更不待言⁵⁷，雖然明代政府

⁵⁵ 因為發源地的關係，上游有東、西泇河，最後匯為泇河；其水源眾多，黃河為泇河主要水源，其他當有南四湖、駱馬湖等。黃河在明代全面奪淮入海，造成水系紊亂，淤塞、改道，時常有之，對於漕運造成很大的影響，因此當時有倡議開泇河以避黃河。關於此，請詳下說明。泇河水系，請見齊月林：《明代泇河之議研究·明代泇河之議的緣起》（鄭州：鄭州大學歷史學碩士論文，2022 年 5 月），頁 19-26。

⁵⁶ 關於石崇湖的文獻甚少，清初楊潮觀（1710-1788）曰：「萬曆中，開泇河。天啟中，開駱馬河，由直口至天妃閘，但用黃河一百八十里耳。若更開石崇湖二十里，則全不用黃河，可以放河北徙，而河之患又避矣。」見（清）楊潮觀：《古今治平彙要·漕運》，收於《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 1 月，影印清雍正七年文聚樓刻本），子部第 31 冊，卷 4，頁 14 下-15 上。說法大抵與夏允彝相同。若結合上引夏允彝的說法，則石崇湖當在駱馬湖之東。意思是：開鑿兩湖，則兩湖之水便足夠資應泇河，漕運便不須擔心黃河的問題。

⁵⁷ 李德楠：〈明代徐州段運河的乏水問題及應對措施〉，《蘭州學刊》2007 年第 8 期（2007 年 8 月），頁 161-162。

想方設法解決，但終無效果。

正因為有上述的問題，故開鑿、經營洳河，成為明代後期治河的課題之一。隆慶四年（1570）年九月，黃河再度決溢，總河侍郎翁大立（1517-1597）請開洳河作為河運的第二條路線，才不致於全仰賴黃河，然而評估工程有三難：一者，穿鑿之時，遇大量山泉水湧出。二者，洳河水中多伏石，施工困難，即使能鑿破，卻又面臨水流湍急而不利航行的問題。三者，沿岸築堤，究竟要耗去多少經費，難以計算。此事遂罷議。萬曆三年（1575），總河都御史傅希摯（1522-1597）有詳細的勘查報告，認為只要避開某些河段與地方，洳河可開而鑿之，因此提出十年計畫；明神宗（1563-1620）下議，結果為給事中侯于趙（1536-1587）反對，理由是要編列至少一百五十多萬金的經費，其他開鑿所需人力與材料，更不計其數，議又遂寢。萬曆二十年（1592），總河尚書舒應龍（1541-1615）主持的工程，始濬洳河，但沒有持續經營，二十五年（1597）、二十八年（1600），朝廷仍在議處，經反覆議論，最後御史張養志（生卒年不詳）提出三點：一者，以沂河之口為入洳河門戶，同時開湖水引入洳河。二者，鑿萬家莊為洳河水源。三者，疏通支河作為緩衝。經動工後，頗有成績，於是得到中央的支持。可惜的是，洳河河口甚窄，僅六丈寬，引水不夠，易於淤積，不利航行。萬曆三十八年（1610），御史蘇惟林（生卒年不詳）建議再利用直河口，引黃河水以通洳河；加上工科給事中何士晉（？-1625）附議，方始認真經營洳河，並設有九道閘口以控制水位。⁵⁸

圖4標示有「沂、洳二河，命諸湖水俱出二口，入黃河」，以及「直河口」同時將黃河之水引入洳河。之所以要引水入洳河，主要是原因是洳河水量太小。從夏允彝的文字來看，洳河固足以負擔漕運，但可能面臨水量不足，進而使糧道

⁵⁸ （清）張廷玉等：《明史·河渠》，卷87，頁2122-2128。須說明的是，圖4的八道閘口不屬於洳河，其右下角有「滕縣」，中段有「嶧縣」，左處有「郯城縣」，比對《中國歷史地圖集》，應是會通河；至於圖5的兩道閘口，當是溝通淮河與長江的運河。見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元明時期》，頁50-51，「山東一」，⑤-4、⑥-4~⑥-5。頁47-48，「南京」，②-6~③-6。蓋夏允彝沿用前人的輿圖，而重點則放在洳河的議題上，故對於各處閘口沒有調整說明。本文就夏允彝論述的重點，故徵引相關文獻，加深說明洳河在明代的重要性。

受阻；如此一來，南方要支應北方就有困難。然而引水濟洳，水量猶有不足，所以他主張再鑿石崇湖以濟洳。與夏允彝同時的李三才（？-1624）奏曰：「至若鎮河閘以下，徐、邳、宿遷、磨兒莊一帶，運道不通，雖有洳河，止行輕小之舟。……自鎮口閘起至磨兒莊，倣照閘河之制，每三十里建閘一座，依時啓閉，以通糧艘。」根據旁邊的批示，此議交由河臣李襄毅負責完成。⁵⁹開鑿洳河，是明代中晚期治河課題之一，若棄洳河而利用黃河為漕道，則礙於河流善徙及決溢，風險太高。然而開鑿洳河不僅有工程上的困難，財政負擔亦相當吃重，這也是自隆慶開始討論，直到萬曆四十八年左右，才認真經營的原因，這份議案前後超過五十年。

可注意的是，引文中夏允彝說：「天啓年又開駱馬湖以接洳，而其所資於黃河者亦少。若再開石崇湖以接洳，縱河使北，不復資之，良為上策」云云。一方面主張透過黃河、駱馬湖增加洳河水量；一方面又主張，若洳河水豐，則可取代黃河為運道。雖然從今人的研究來看，明代「議開洳河」是為「避黃行運」⁶⁰，但是從上文所述，以及夏允彝的說法，應是「運用黃河以充足洳河水量」、「運用洳河，適時避開黃河」兩者兼具。再者，現今研究指出，明代議開洳河是為經濟需求。⁶¹誠然，但是夏允彝的主張不止於此，經濟的目的在於支持的國防。因為夏允彝活動於明季，適逢遼東戰事，所以著眼於經濟層面以加強國防，全力主張以河道為漕運。並且透過注解〈禹貢〉發揮政見，期待政府能修復、保養運

⁵⁹ 見（明）陳子龍等輯：《皇明經世文編·李修吾奏稿·勘議河工截留漕糧疏》，集部第28冊，卷421，頁2下。

⁶⁰ 馬同軍：〈明代「避黃行運」思想及其實踐〉，《蘭臺世界》2011年第14期（2011年7月），頁50。張景瑞：〈議洳河：晚明通漕與治河之爭〉，《河南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9卷第4期（2018年10月），頁89-90。事實上，「避黃行運」也並非今人的識見，上述翁大立倡議開洳河便是想全面之取代黃河。夏允彝的想法大抵是延續前人之見，因此融合了「以洳河代黃河」、「黃河資洳河」的策略，至於兩者有沒有衝突與矛盾，礙於篇幅，此處暫不討論。翁大立的說法，見（清）傅澤洪：《行水金鑑·運河水》，收於《四庫全書》第58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影印文淵閣本），卷120，頁3上。

⁶¹ 齊月林：《明代洳河之議研究·明代洳河之議的緣起》，頁26-28。

河，使能善用運河集中南方資源，透過運河北上支持邊境，進而支援戰事。⁶²

四、《禹貢古今合註》對黃河治理的觀點

夏允彝撰寫《禹貢合註》的目的非常鮮明，於〈凡例〉開宗明義曰：「漢時求治河，輒使能治《尚書》者。古人習經，固將施之用也；今治《尚書》者，不乏人爲應舉之具而已。問以水道，蒙如雲霧，豈窮經之謂乎？」⁶³ 陳恆嵩先生嘗簡要比較明、清兩代的學術特色，所謂明儒學問之「空疏」，其實是著重經世；清儒學問之「篤實」，反而無益於現實。⁶⁴ 就夏允彝的話來說，「篤實」之學便是通曉水道，尤其黃河的治理，更是攸關民生。

〈禹貢〉：「導河積石。」《正義》曰：「河源不始於此，記其施功處耳。」積石不是黃河的發源地，是大禹從積石開始疏導、治理黃河。至於河源在哪裡？根據《正義》記載，唐以前有河出崑崙，或出葱嶺，或出于闐⁶⁵，眾說紛紜。元代控有的版圖最大，開啓探勘河源的任務，《元史》有一篇〈河源附錄〉，文曰：「河源，古無所見。〈禹貢〉導河，止於積石。」又曰：「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爲招討史，佩金虎符，往求河源。……西去愈高，四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并圖其城傳位置以報。其後，翰林學士藩昂霄從都實之弟闊闊出得其說，撰爲〈河源志〉。」⁶⁶ 〈河源志〉是專程探勘河源的紀錄，內容詳細記載河源周遭的風景及名稱，描述如何從涓涓細流而成大河。值得一提的是，上

⁶² 陳恆嵩：〈通經以致用：明代〈禹貢〉學〉，收於陳恆嵩：《禹貢、經筵、科舉：宋明《尚書》學新探》，頁 173-177。唯該文對於夏允彝主張開浹河並未著墨。

⁶³ （明）夏允彝：《禹貢古今合註·凡例》，頁 2 上。

⁶⁴ 陳恆嵩：〈通經以致用：明代〈禹貢〉學〉，收於陳恆嵩：《禹貢、經筵、科舉：宋明《尚書》學新探》，頁 150-151。

⁶⁵ 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疏：《尚書正義·禹貢》，收於《十三經注疏》第 1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公司，2007 年 8 月，影印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本），卷 6，頁 25 上。

⁶⁶ （明）宋濂等：《元史·地理·河源附錄》第 5 冊（北京：中華書局，1976 年 4 月），卷 63，頁 1563-1564。

文談到的朱思本，他又得到帝師流傳出來的梵文圖、書，其中也有記述河源的文字，後譯為漢文。換言之，關於河源的記載，有兩處文獻來源，〈河源附錄〉根據兩家之說而統整之。⁶⁷由於元代已探得河源，因此明代學者多半能指出河出崑崙，以及河源周遭環境；夏允彝既留心〈禹貢〉，自亦不能例外。《禹貢合註》從茅瑞徵《禹貢匯疏》模得兩幅「河源圖」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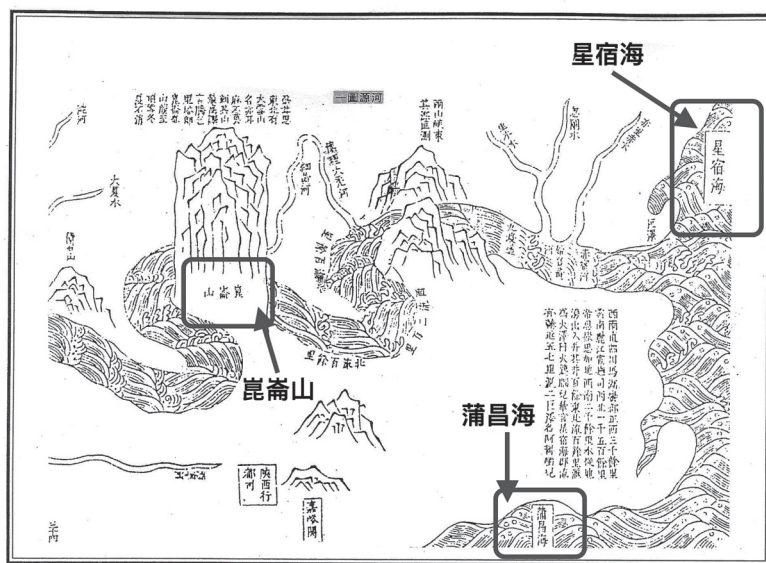


圖 6 《禹貢古今合註》「河源圖一」⁶⁸

⁶⁷ (明)宋濂等：《元史·地理·河源附錄》第5冊，卷63，頁1564。

⁶⁸ (明)夏允彝：《禹貢古今合註》，頁(總)36，「河源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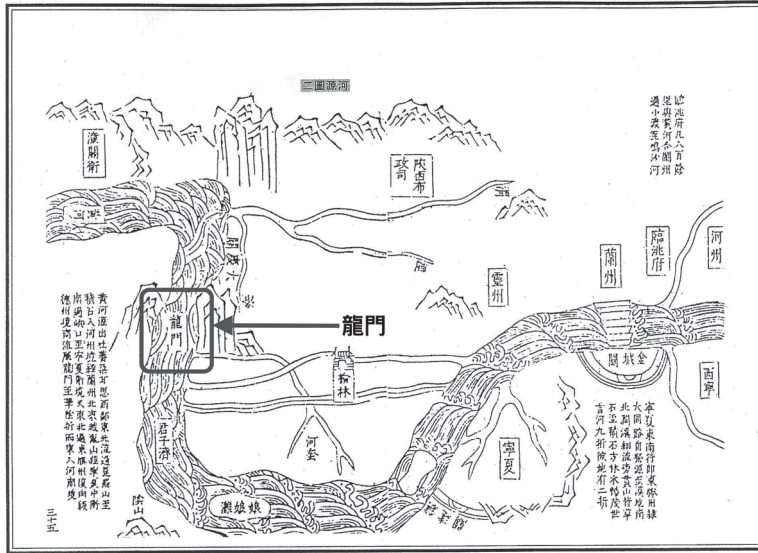


圖 7 《禹貢古今合註》「河源圖二」⁶⁹

河源遠在崑崙山，其實未必與治河有關。茅瑞徵引朱熹（1130-1200）之語：「禹當時治水也，只理會河患，積石、龍門，所謂『作十三載乃同』者，正在此處，向未經鑿治時，龍門正道不甚泄，故一派〔派〕西衰〔滾〕入關、陝，一派〔派〕東衰〔滾〕往河東，故此處患最甚。禹自積石至龍門著工夫最多，又其上散從西域去，亦不甚為患。」⁷⁰ 河源在什麼地方，不是〈禹貢〉所在意者，言「導河積石至于龍門」，說明此段河患嚴重。積石、龍門上游，既無河患，則探討河源實在與治河、民生關係不大，可以置之不論。

面對前人屢屢討論河源，夏允彝引明代王鑿（1450-1524）的說法：「皆未覩所謂崑崙，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踰之，何崑崙之近乎？是不宜以一夫之目，廢千古之論。終以《水經》所載，崑崙在西北，河水出其西北陔，東南流入渤海為近是。」⁷¹ 王鑿認為討論河源之「崑崙」，當就《水經》為主，不必從後

⁶⁹ （明）夏允彝：《禹貢古今合註》，頁（總）37，「河源圖二」。

⁷⁰ （明）茅瑞徵：《禹貢匯疏》，卷11，頁19下-20上，「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⁷¹ （明）夏允彝：《禹貢古今合註》，卷4，頁20下-21上，「導河積石至於龍門」。

世紛紛之說。況且探勘者僅是少數，以少數人的論點而質疑經典的說法，實不可取。王鑿之說，認同河出崑崙，唯此崑崙是《水經》的崑崙，不是後世探勘的崑崙；朱子認為探討河源非重點，重點在積石以下乃河患處。夏允彝面對前人之說，而且他兩幅「河源圖」模自茅瑞徵。如此，該如何看待呢？夏允彝的輿圖，固然是出自茅瑞徵，但取意不同。茅瑞徵先引歷來關於河源之說，最後以朱子之論作為結尾，其意思當是認可朱子的想法。夏允彝同樣羅列歷來河源的論述，而以王鑿作結，夏允彝接著說：

自古咸言河出崑崙，重源潛〔潛〕發，淪于蒲昌，逕積石而為中國河，故曰「潛〔潛〕崑崙之峻極，出積石之嵯峨」。〈西域傳〉云：「河自蒲昌潛〔潛〕行地下，南出積石。」蒲昌即鹽澤也。《山海經》曰：「東望渤海，河水之所潛，其源渾渾泡泡者也。」〔《水經注》〕「東至玉門關，一千三百里，其水澄渟，冬、夏不減，其中洄湍電轉，為隱淪之脉〔脈〕，當濃流之上，飛禽奮翮于霄中者，無不墜于淵波，即河水之所潛〔潛〕而出于積石山者也。」經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河始闢。⑦

這段話融合了《水經》、《水經注》、《山海經》及《漢書·西域傳》，謂崑崙在西北，不在西南處，故圖6所繪崑崙在西北。自崑崙出而入星宿海，是根據於過去探勘的紀錄。自崑崙至蒲昌海這段沒有繪製水流，是因為水潛行地下，不可得見；蒲昌海以後，水始浮出，奔流至積石，水流益大，所以禹治河從積石開始，這是夏允彝所著重的地方。換言之，茅瑞徵的「河源圖」既繪出前人探勘所得的結果，也融合了舊說於圖中；夏允彝則根據其圖，置入王鑿的論點。

雖然河源與治河未必有直接關係，卻有影響。為什麼河自積石開始為患？必然是在此處水變成巨流，若依次往上溯，則有蒲昌海，有崑崙。值得注意的是，

⑦ （明）夏允彝：《禹貢古今合註》，卷4，頁21上-21下，「導河積石至於龍門」。

〈西域傳〉提到的蒲昌海，「其水亭居，冬、夏不減增減」，清代胡渭（1633-1714）解云：「河，神物也。潛流所在多有。」又云：「然鹽澤受西域數大川之水，隱淪之脈，豈無所發越而遂止？」⁷³指出河自崑崙至蒲昌海這段潛流過程，融匯了不少川水，正因為潛流不見，隱藏災害而沒有被察覺，易使人忽略，所以「禹導而通之，出積石山」。⁷⁴除了是替「導河積石」找出說法外，目的是要讀者關注其間潛流暗川匯聚之後，水流一旦變大就容易形成河患，不可不慎。

理解河源與河患之間的關係後，接著討論如何導河？其圖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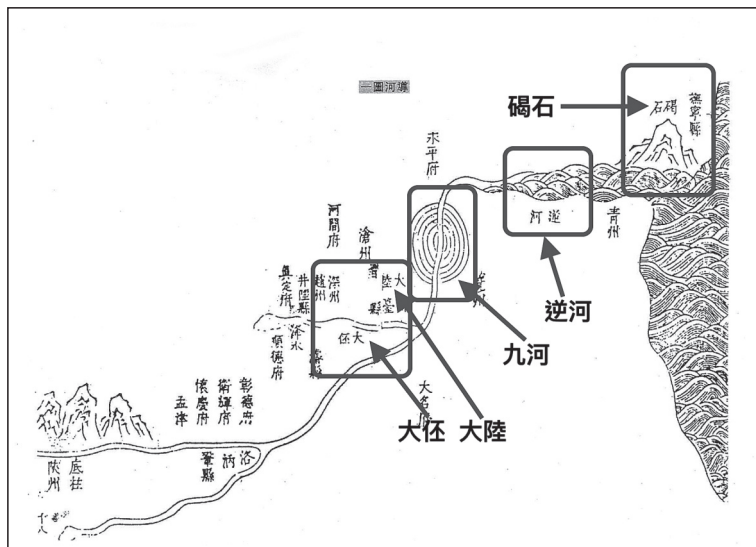


圖 8 《禹貢古今合註》「導河圖一」⁷⁵

夏允彝曰：

大抵大伾以上，河道不改；大伾而北過澤水，故迹〔跡〕不可復知。若九河久湮，更不可考。王衡《新論》曰：「聖人于冀、兗間，逆設為河，以

⁷³ （清）胡渭撰，鄒逸麟整理：《禹貢錐指·附論河源》，卷 13 上，頁 427-428。

⁷⁴ 同前註，頁 428。

⁷⁵ （明）夏允彝：《禹貢古今合註》，頁 22，「導河圖一」。

防暴至之患。未至，則不妨于民耕；既至，則不墮民舍。」程琬曰：「禹因地之形而逆設為九河，凡河之道，則不建都邑，不為聚落，不耕不牧，以防其決，故謂之逆河。」按，河過大陸，趨海，勢太土平，遷徙不常，自播為九，禹因而疏之耳。……蓋〔蓋〕以合流則迅，分流則緩；迅則力能刷沙，緩則泥沙日積，積久則河高不能行，下流淤則上流決〔決〕。⁷⁶

又曰：

略採古今治河之論而裁其異同。……今隄防陜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太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有泛濫，替〔期〕月自定。難者將曰：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迺〔乃〕人功所造。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萬萬，及其大決〔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曰上策。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據堅地作之，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叩〔叩〕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為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服引取之。旱則開協堂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二〔三〕害：民常罷于救水，半作失業，水行地上；湊潤土微，民則病濕；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決〕溢有敗，為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濕，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薪買石之

⁷⁶ （明）夏允彝：《禹貢古今合註》，卷4，頁25上-26下，「導河積石至於龍門」。

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灌溉，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此誠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培薄，勞費無已〔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⁷⁷

上述夏允彝謂「導河積石」，乃河出崑崙以後，有一大段潛流而行，致使無法預見河勢之大。此外，河自崑崙以後，又有九曲，「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⁷⁸，則水勢於河道曲直之間逐漸累積。雖然如此，在大伾以上河段，尚且單純；一過大伾，河道開始出現兩種情況：一者，散為九河，原先九河是為減緩黃河流速，但缺點是泥沙容易淤積。二者，下游平原，便於耕種，因此民眾引水灌溉，益使原先下游流速不快的黃河，愈加淤塞不通。⁷⁹雖然九河故道早已不可考，夏允彝權衡解經與現實情況，認為九河近海，當海口淤積之時，河水與海浪，正好可以協力帶走泥沙，而且他認為這是大禹所以在下游闢為九河的用意。⁸⁰治河上策，當效法大禹，鑿開阻擋河水的地方，其中遷徙人民，固有不小，卻總比每年耗費許多經費以修河隄來得長遠。這條上策的計畫，從現實層面來看，多有窒礙難行之處，而夏允彝為什麼會視此為上策？據《明史》所載，洪武二十三年（1390），「修崇明、海門決堤，二萬三千九百餘丈，役夫二十五萬人」，四川宣慰使上奏：「所轄水道百九十灘，江門大灘八十二，皆被

⁷⁷ （明）夏允彝：《禹貢古今合註》，卷4，頁27下-29下，「導河積石至於龍門」。

⁷⁸ 同前註，卷4，頁23上-23下，「導河積石至於龍門」。

⁷⁹ 夏允彝引《新論》之言：「河水濁，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令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決，以其壅不泄也，可禁民勿復引河。」同前註，卷4，頁26下-27上，「導河積石至於龍門」。

⁸⁰ 同前註，卷4，頁27上，「導河積石至於龍門」。須說明者有二：一，胡渭曰：「蓋自大伾以東，古兗、青、徐、揚四州之域，皆為其縱橫糜爛之區。」又曰：「河自大伾以下，行平地數為敗。」則大伾以東，是黃河泛濫之始。二，傳統學者認為九河固然不可詳考，但仍相信是禹施功所致，而所以有九河，目的正是為殺河之勢，故胡渭引用夏允彝的看法，以示認同。上述見（清）胡渭撰，鄒逸麟整理：《禹貢錙指·禹貢錙指略例》，頁11；卷2，頁21，「冀州」；卷3，頁69-70，「九河既道」。

石塞」。⁸¹ 這段短短的史料，提供驚人的數據：近海處的崇明、海門潰隄，致使政府投入二十五萬民力；遠在四川的水道，竟有超過兩百處河段被沙石所壅塞！所以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以後，修隄與開運河、清理湖水等同步進行，像是「築上虞海隄四千丈，改建石閘。濬定海、鄞二縣東錢湖，灌田數萬頃」。⁸² 如此耗費民力、物力的治河方式，便知夏允彝何以主張效仿大禹鑿龍門，移除任何擋水入海的屏障物。

治河必須考量兩個大面向：蓄水以濟旱、洩水以備潦，最不可為者就是興建隄防堵水，將低者加高，將薄者增厚，增固隄防以阻止黃河泛溢，而實際上大水一來便潰隄，如此循環反覆無休止，只是勞民傷財而已，故夏允彝反對不以疏通而屢建隄防的治河方式。其實夏允彝提出的上策必得配合中策，方能實現。因為上策效仿大禹鑿龍門、伊闕、底柱等計畫，然而於現實環境中不易施行。另一種渲泄的方式是「多穿漕渠」，這也呼應上一節開鑿運河的情況。因為運河可以藉由水門控制水量，最為便利。夏允彝的中策，筆者以為可釐為第一策與第二策。第一策是上策，「開駱馬湖以接洳，再開石崇湖以接洳」，以駱馬、石崇兩湖濟運河。第二策是下策，「議別穿漕渠縱河使北者，以漕之用河，非漕之利也，不得已而用之耳」⁸³，即以河濟運河。當然，以河濟運河，誠如上文介紹，是明季的治河與漕運方式。要之，治理黃河有諸多面向要考量，民田可否生稼、漕運的分配等，如果能做到近海之處，田多鹽鹵，以水濟之，方生莊稼；加上有運河，更足以「通官舟以餉軍」⁸⁴，當是對國家最有利之事。

五、結語

綜上所述，結論有三：

⁸¹ （清）張廷玉等：《明史·河渠》，卷 88，頁 2146。

⁸² 同前註，頁 2146。

⁸³ （明）夏允彝：《禹貢古今合註》，卷 4，頁 35 上，「導河積石至於龍門」。

⁸⁴ （清）張廷玉等：《明史·河渠》，卷 88，頁 2146。

一者，夏允彝活動於明季，是復社的成員。明亡之後，投淵而死。史載夏允彝「學務經世，歷朝制度暨昭代典章，無所不諳習。獨處一室，志常在天下」。他觀察同科進士陳子龍熟諳山水道路，更策勵自己措意〈禹貢〉山水，進而撰寫《禹貢古今合註》。其內容專注於水利、屯田、邊防及漕運等，彰顯「志常在天下」的胸襟。

二者，經筆者比對，《禹貢古今合註》的內容，尤其書前所附的輿圖，遠有所源。輿圖幾乎襲自茅瑞徵的《禹貢匯疏》，而《禹貢匯疏》又承自鄭曉的《禹貢圖說》。由於夏允彝自述參考茅瑞徵的作品，因此就《禹貢古今合註》與《禹貢匯疏》相比較，二書有 49 幅圖，其中有 34 幅圖，兩者都沒有在圖外附上說明；所餘 15 幅圖中，僅有 1 幅的說明與《禹貢匯疏》不同，其他則是詳略有別。就輿圖方面，夏允彝直接沿用茅瑞徵的作品。不過兩者的差別在於，茅瑞徵《禹貢匯疏》羅列許多學者的注解、及解經內容，較具學術理論；夏允彝則以經世為目的，對於經學理論、傳統注家的辨析，皆不予收錄或討論，而是切合實際環境，抒發己見。

三者，夏允彝《禹貢古今合註》可概分為「國防與漕運」及「治理黃河」兩方面討論。其一，雖然夏允彝的著作襲自茅瑞徵《禹貢匯疏》，不過對國防、漕運的想法不同。明代曾經有海運，但後來僅利用運河；茅瑞徵認為，全仰整運河的缺憾是，一旦運道發生不可預測的事情，將影響邊境的運輸，進而使國防陷入危機。不過夏允彝認為，明代初期原先仰賴海運，最終廢止，是因為海象難測，易使人員傷亡，故而轉向運河，是以當全力發展運河才是。再者，若因地勢實施屯田，留意溝洫、運河等，不僅可以將資源運往邊境，也可使邊境善用當地資源，自可阻止鐵騎南下。夏允彝既然強調運河的重要性，其中以汧河為主要運河，並且希望當局善用黃河、駱馬湖，為確保汧河水量足以為漕道，更建議開石崇湖以資汧。然而根據史料所載，開鑿汧河為漕道並非易事，因為水中怪石林立，增加施工的難度。其次，據現今研究成果，多以為明代開汧河是出於經濟考量，但就夏允彝的論點來看，是將開汧河視為國防上的計畫之一。

其二，治理黃河方面。由於元代統治幅員遼闊，因此對黃河源頭的探查較為精準，也留下相關的文獻記錄。茅瑞徵的書中提及黃河源頭，夏允彝大量參考其

書，自然也受到影響。經分析，夏允彝固然認為瞭解黃河源頭與治水關係不大，但也藉著承襲前人的輿圖與論點，指出自源頭至〈禹貢〉所載「積石」一段，是黃河潛行地下不可得見的情況，水勢一旦匯聚起來，便難以預測及治理，故藉之提醒讀者當關注黃河潛行地下而後匯流的水勢。夏允彝更關注於黃河進入大伾以後，由於平原地勢，因此水流變緩，形成泥沙淤積進而抬高河床，黃河便會溢出河道，造成後續一系列的泛濫、改道等。夏允彝主張，應該清除阻擋黃河的障礙地形，即使過程中要遷移鄰近的居民。原因是，明政府大量投入資源，黃河下游依然潰隄、上游則有超過數百段的河道壅塞，故認為當致力於移除河道上的障礙，方能有效治河。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題（春秋）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左傳正義》，收於《十三經注疏》第6冊（臺北：藝文印書館公司，2007年8月，影印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本），卷26。

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疏：《尚書正義·禹貢》，收於《十三經注疏》第1冊（臺北：藝文印書館公司，2007年8月，影印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本），卷6。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萬卷樓出版公司，2002年8月）。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匠人》，收於《十三經注疏》第3冊（臺北：藝文印書館公司，2007年8月，影印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本），卷42。

（元）朱思本：《貞一齋詩文稿》，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第132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影印宛委別藏清抄本），不分卷。

（明）宋濂等：《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4月）。

（明）鄭曉：《禹貢圖說》，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第5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影印明刻項皋謨校本）。

- (明)熊廷弼：《經遼疏牘》，收於沈雲龍選輯：《明清史料彙編 第二輯》第9冊（永和：文海出版社，1967年5月），卷3。
- (明)茅瑞徵：《禹貢匯疏》，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第5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影印明崇禎刻本）。
- (明)劉侗：《帝京景物畧》，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1996年8月，影印天津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史部第248冊。
- (明)夏允彝：《禹貢古今合註》（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年6月，《中國歷史地理文獻集刊 第一編 禹貢集成》影印明末刻本）。
- (明)夏允彝：《禹貢古今合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明末刻本）。
- (明)張溥：《七錄齋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1月，《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明崇禎吳門童潤吾刻本）。
- (明)陳子龍：《安雅堂稿》，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第138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影印明末刻本），卷13。
- (明)陳子龍等輯：《皇明經世文編》（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1月，《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明崇禎雲間平露堂刻本）。
- (清)胡渭撰，鄒逸麟整理：《禹貢錐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1月）。
- (清)王鴻緒等：《明史稿列傳》，收於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 附索引》第97冊（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1月），卷153。
- (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4月）。
- (清)李衛等修，沈翼機等纂：《（雍正）浙江通志》，收於孫學雷主編：《地方志·書目文獻叢刊·經籍》第16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12月，影印清光緒二十五年浙江書局刻本），卷241。
- (清)楊潮觀：《古今治平彙要》，收於《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1月，影印清雍正七年文聚樓刻本），子部第31冊。
- (清)永瑤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印書館，1983年10月，影印武英殿本）。

（清）阮元：《擘經室集》，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47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影印道光阮氏文選樓刻本），第1集卷12。

（清）傅澤洪：《行水金鑑》，收於《四庫全書》第58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影印文淵閣本），卷120。

二、近人專著

（一）專書

丁國祥：《復社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年12月）。

馬大正：《中國邊疆經略史》（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10月）。

陳恆嵩：〈通經以致用：明代〈禹貢〉學〉，收於陳恆嵩：《禹貢、經筵、科舉：宋明《尚書》學新探》（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9年4月），頁150-179。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年10月）。

（二）期刊論文

李德楠：〈明代徐州段運河的乏水問題及應對措施〉，《蘭州學刊》2007年第8期（2007年8月），頁161-165。

侯美珍：〈明代鄉會試《尚書》義出題考察——以考官出題偏重爲主的討論〉，《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47期（2015年9月），頁137-172。

孫慧敏：〈書寫忠烈：明末夏允彝、夏完淳父子殉節故事的形成與流傳〉，《臺大歷史學報》第26期（2000年12月），頁263-307。

馬同軍：〈明代「避黃行運」思想及其實踐〉，《蘭臺世界》2011年第14期（2011年7月），頁50。

陳佳榮：〈元明間《輿地圖》源流考思〉，《海交史研究》，2014年第2期（2014年12月），頁36-43。

張景瑞：〈議汧河：晚明通漕與治河之爭〉，《河南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9卷第4期（2018年10月），頁88-95。

楊宏雨：〈湮沒的帝都與大明的興亡〉，《哈爾濱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1年第1期（2011年1月），頁94-96。

（三）學位論文

王榮煜：《明代〈禹貢〉學研究》（濟南：山東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2019年5月）。

劉莞莞：《復社與晚明學風》（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年6月）。

齊月林：《明代洳河之議研究》（鄭州：鄭州大學歷史學碩士論文，2022年5月）。

（四）電子資源

（明）夏允彝撰，張孔瑛輯：《輯存夏文忠公集》（清光緒年間抄本，藏浙江圖書館）。引自浙江圖書館館藏電子檔（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9/9d/ZJLib-62836c29d8147868cc53272c_%E5%A4%8F%E6%96%87%E5%BF%A0%E5%85%AC%E9%9B%86%E4%BA%94%E5%8D%B7%E5%BC%9B%E9%99%84%E9%8C%84%E4%B8%80%E5%8D%B7.pdf）。（上網檢索日期：2026年1月19日。）

題（明）夏允彝：《刻夏先生書經》，藏於日本內閣文庫，見「國立公文書館」（<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search?kw=%E5%88%BB%E5%A4%8F%E5%85%88%E7%94%9F%E6%9B%B8%E7%B6%93>）（上網檢索日期：2026年1月19日）。

Inquiring into Antiquity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Current Affairs: An Analysis of Xia Yunyi's Water Control Strategies Based on *Yugong Gujin Hezhu*

Chien, Cheng-Ho

Proje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A Combined Commentary on the Ancient and Modern Yu Gong (Yu Gong Gu Jin He Zhu), consisting of five volumes, was written by Xia Yunyi (1596-1645)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with a preface composed by Chen Zilong (1608-1647). Liu Qiyu (1917-2012) remarked: “Both Xia and Chen were patriotic scholar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whose study of the Yu Gong stemmed entirely from their desire to save the nation and rectify the times.” This points out the core purpose of Xia Yunyi's work on the Yu Gong, the content of which discusses water conservancy, military farming (tuntian), frontier defense, and grain transport via waterways—topics that are indeed deep and wide-ranging. This article focuses primarily on the aspect of “water management,” which is explored in two parts: national defense and waterway grain transport, and the governance of the Yellow River.

Xia Yunyi's work, *Yu Gong Hui Shu*, built upon the scholarship of Mao Ruizheng (whose life dates are unknown), who himself had followed the tradition of Zheng

Xiao's (1499-1566) *Yu Gong Tu Shuo*. A comparativ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Yu Gong Tu* maps in all three texts are almost identical. Nevertheless, while building on the achievements of his predecessors, Xia Yunyi made slight adjustments to the commentary to reflect his own idea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se adjustments to offer a glimpse into the legacy of Xia Yunyi's *Yu Gong Gu Jin He Zhu* within the history of Confucian classics, alongside his strategies for flood control and water management.

Keywords: Xia Yunyi, *Yugong Gujin Hezhu*, Water Control, *Yugong* (Tribute of Yu), Yellow River